

中国

21世纪前期

对外战略的选择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A CHOIC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21ST CENTURY

李而炳 主编

- ◎ 环境分析：21世纪前期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特征
- ◎ 历史启示：20世纪新兴大国对外战略的宏观考察
- ◎ 探索与争鸣：关于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争论
- ◎ 寻求战略平衡：中国大国战略的必然选择
- ◎ 伙伴与对手：中国对美战略的基本定位
- ◎ 国际新秩序：中国对外战略的全球构想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五”规划重点课题

21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

主 编：李而炳

副主编：丁诗传 翟晓敏

朱听昌 周桂银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 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 / 李而炳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4

ISBN 7-80009-826-5

I .2… II .李… III . 对外政策 - 研究 - 中国 - 21 世纪
IV .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2853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2 字数: 59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5.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问题研究）“十五”规划首批重点立项课题《21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的最终成果。课题立项获得批准后，项目主持人（主编）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政委李而炳少将组织课题组成员对研究的指导思想、宗旨目标、框架结构和编写细目，反复切磋讨论，逐步深化认识，尔后分工撰写。研究过程中，副主编丁诗传、翟晓敏、朱听昌、周桂银协助主编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和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

本书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在主编李而炳领导下的集体攻关成果，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建设的重要著作。课题组成员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夙兴夜寐，辛勤笔耕，潜心探索，深钻细研，三度春秋，数易其稿，力求以较高质量和富有创新性的成果奉献给读者。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既为完成一项富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工作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忐忑不安。

本书各章撰写人分别是：绪论：李而炳（研究员）；第一章：丁诗传（教授、博导）；第二章：周桂银（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第三章：崔建树（讲师、在读博士生）；第四章：宋德星（副教授、在读博士生）；第五章：朱听昌（教授、博导）；第六章：翟晓敏（教授、博导、军事学博士）；第七章：葛腾飞（讲师）；第八章：刘飞涛（讲师、在读博士生）；第九章：杨光海（副教授、在读博士生）。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曾参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借鉴和吸纳了众多国内外作家学者的学术成果，曾得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训练部和国际关系系的大力支持、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尽管我们为提高书稿的质量已竭智尽力，但基于本课题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诸多领域，且国际战略形势复杂多变难以预测，加上水平所限，因此书中难免存在疏漏、缺失和问题，恳请军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课题组

2004年5月16日

目 录

绪 论..... (1)

上篇：中国对外战略选择的基本依据

第一章 环境分析：21 世纪前期国际战略形势的
 基本特征 (19)

 第一节 和平与发展：新考验与新机遇 (20)

 第二节 世界格局：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41)

 第三节 大国关系：基调未改变，呈现新特征 (51)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祸福相倚与发展不平衡 (59)

 第五节 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65)

第二章 历史启示：20 世纪新兴大国对外战略的
 宏观考察 (80)

第一节	美国：从孤立主义到全球霸权主义	(81)
第二节	苏联：一个超级大国对外战略的成败	(92)
第三节	德国：世界政策和欧洲政策	(108)
第四节	日本：“三次远航”	(122)
第五节	美、苏、德、日对外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132)
第三章 利益界定：21 世纪前期中国国家战略的		
	基本目标	(137)
第一节	西方国家利益理论与中国国家利益观	(138)
第二节	21 世纪前期中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150)
第三节	中国实现主要战略目标的机遇与挑战	(168)
第四章 探索与争鸣：关于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		
	论争	(192)
第一节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中国世纪性 对外战略选择	(194)
第二节	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审视	(202)
第三节	有关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理论分析 与学术争鸣	(209)
第四节	大战略视角下的中国世纪性外交战略	(219)
第五节	对中国学界关于 21 世纪前期中国外交战略	

探索和争鸣的学理评说 (228)

下篇：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内容

第五章 寻求战略平衡：中国大国战略的必然选择 (235)

第一节 战略平衡思想的理论渊源 (236)

第二节 中国寻求战略平衡的必然性与现实基础 (251)

第三节 构建以亚太地区为重心的全球均衡体系 (266)

第六章 伙伴与对手：中国对美战略的基本定位 (284)

第一节 中国对美战略的历史演变 (285)

第二节 21世纪前期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 (296)

第三节 中美对外战略的碰撞与磨合 (321)

第七章 立足亚太 稳定周边：中国对外战略的

优先考虑 (336)

第一节 中国对外战略优先考虑亚太与周边的依据 (336)

第二节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地缘战略架构 (346)

第三节 从中国对外战略全局高度对立足亚太
稳定周边的评价 (378)

第八章 团结第三世界：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	(385)
第一节 第三世界国际地位的变迁	(386)
第二节 第三世界与中国国家利益	(403)
第三节 团结和依托第三世界	(420)
第九章 国际新秩序：中国对外战略的全球构想.....	(436)
第一节 国际秩序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	(437)
第二节 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国际秩序构想.....	(455)
第三节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途径与手段	(469)
参考文献	(489)

绪 论

本书的宗旨在于全面论述 21 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选择的基本依据，精心谋划对外战略的基本构想。全书分上、下篇，共九章。

上篇着重从国际环境分析、历史启示、国家利益界定和理论探索与争鸣等方面，阐释 21 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选择的基本依据和前提条件。实事求是地判断未来二十年的国际战略环境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正确抉择的客观根据。最高决策者以国际战略的宽广视野，审时度势关注的重点应是在长时期内、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世界发展大趋势，即深刻认识时代主题，深刻认识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深刻认识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特征，力求对总体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作出符合实际的宏观把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辩证唯物的观点考察 20 世纪美、苏、德、日等国对外战略的成败得失，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对于设计 21 世纪前期中国的对外战略，无疑是重要的参照系。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导原则，运用科学的国家利益观，全面准确地界定 21 世纪前期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如实地剖析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目标将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于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恰当评估学界关于中国对外战略理念的探索和论争，总结和吸取建国五十多年来外交战略演进的宝贵经验，以期对 21 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选择寻求科学的理论基石。总之，国际环境分析、历史启示、国家利益判断和学术理论创新的有机结合，是 21 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正确抉择的基本前提和基本依据。

下篇主要从大国战略、对美关系、亚太和周边外交、对第三世界的关系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 21 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构想。

21 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1 世纪前期中国

的对外战略是实现和平崛起的对外战略。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综观全局，21 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①这是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重要的战略判断。中国的和平发展机遇与正确的对外战略密不可分，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新世纪之初中国的外交工作做了明确部署，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外交工作应该坚持的方针政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十六大报告的有关精神，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精心筹划 21 世纪前期中国的外交战略。

中国的外交战略应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由总体外交战略、对大国的外交、周边外交、对第三世界的外交和多边外交等不同层次的五个部分组成。

一、总体外交战略

总体外交战略的制定，应站在国际大战略的高度，界定新世纪头二十年中国的历史方位，确定中国外交的宗旨、目标，对力量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相应的政策策略原则。

中国外交应该以服务于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根本宗旨。前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后者表明了和平崛起的中国肩负的崇高国际责任和对人类社会进步所作的日益巨大的贡献。两者相辅相成，反映了中国的战略目标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紧密相联，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紧密相联。

外交工作的直接目标是不断优化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营造优良的环境，一是要争取外部环境的长期和平与稳定，确保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外来的威胁、侵犯和损害；二是要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与统一，有利于世界的普遍繁荣。这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平崛起国家战略向外交工作提出的两大需求，前者是基本性的安全需求，后者是高层次的发展需求。而且随着中国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8 页。

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其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特别是促进周边地区振兴的目标将会日益彰显。因此，中国外交的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

外交工作的宗旨、目标必须与外交的能力、手段相对称，要按照国家能力来规定目的，这是外交战略正确决策的要诀。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综合国力和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是外交工作实现根本宗旨，达到预定目标的可靠基础和后盾，是外交工作可以调动运用的手段与力量的源泉。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相比于外交的宗旨与目标，中国的整体实力显得不够强大，还不能为宗旨、目标的实现提供充分足够的保障。鉴于国力不足，深谋远虑地制定和实施明智务实的外交战略策略和政策原则，就显得特别重要。其目的在于巧妙运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积极争取外部的借助力量，并尽量消除或减少阻力，以谋求外交工作的最佳效果。为了卓有成效地完成国家大战略赋予的艰巨而崇高的使命，中国外交应以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为指针，以战略平衡为基本原则，以合作与制衡为两手，合理部署和积极开展六个方面的外交工作。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如今坚持独立自主的要旨在于努力提高独立自主的外交决策水平和实施能力，而不再像以往侧重于捍卫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与权利。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集中体现在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四项基本主张”，即：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①

这里讲的以战略平衡为基本原则是对邓小平有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美苏争霸的新态势，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了战略平衡原则，宣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依附哪个集团，也不同哪个国家搞战略关系”，“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②从而使中国成为中美苏“大三角”中真正的一角，成为美苏两极之间一支不依附于任何一方，又不容任何一方轻视的战略平衡力量。如今我们强调要以战略平衡原则为核心架构中国外交战略，其内涵更为丰富和扩展。因为，在国际力量严重失衡的新形势下，中国要继续充当战略平衡力量，发挥战略平衡作用，就必然要求中国外交要针对新情况，

①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162页。

适应新环境，创造性地运用战略平衡原则，要求中国外交战略的内在诸要素构成和外在工作部署以及谋求的国际力量对比，都应贯彻战略平衡原则，以求实现总体平衡或综合平衡。依照这一原则设计外交战略的内在要素结构，就需力求做到：一是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的结合与平衡，以求利义恰当兼顾，防止惟利和惟义倾向；二是外交宗旨、目标与实力、手段的平衡，以求主观需求与现实能力相对称；三是外交工作全方位与有重点之间的平衡，以求点面结合，相辅相成。内在诸要素的平衡可以保证外交战略的合理性、可靠性和高效性。依照战略平衡原则谋划外交工作的部署，就需总揽全局，统筹考虑轻重主次。首先使对大国、周边和第三世界三个外交重点之间保持平衡，应以对大国外交为关键，以周边外交为首要，以对第三世界的外交为基础。其次在大国关系中，应力求使与美、俄、日、欧的关系保持平衡，争取中国与各大国的关系并行不悖发展，良性互动。依照战略平衡原则谋求国际力量平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逐步改变目前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状态，推动多强与一超的力量对比趋于相对平衡，推动亚太地区和周边次区域的主要力量对比趋于相对平衡，以利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对单极霸权构成愈益有效的硬制衡。中国奉行战略平衡原则，谋求和创造平衡，是为了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以有利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这与超级大国为了一己私利，制造、利用和操纵均势，谋求居高临下的支配地位有着本质的区别。

以合作与制衡为两手，而不是通常讲的以合作与斗争为两手。这里用制衡取代斗争是基于以下新的认识。首先，在国际政治中，斗争是矛盾双方的外部冲突形式，实行的是零和游戏规则。在现实世界里，采用斗争方式解决矛盾，一是难奏效，二是代价高，对大国而言更是斗则互损。制衡则是一方以实力（自身的实力加上国际上的借助力量）和从政治、外交等方面对对方的政策、行为构成某种有形或无形的但又是比较确定的牵制与约束，它追求的不是胜负输赢分明的结果，而是使对方损及己方利益的政策、行为和趋势得到有效制止或阻滞，尽量削弱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其二，中国国力的发展壮大，外交工作的卓有成效以及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使得如今的中国已不存在现实的敌对国家。一心一意谋求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尽管中国同一些国家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尽管中国依然面临着美国全球霸权主义的综合性威胁，迫使中国仍不得不考虑应对外部强加的对抗与斗争，但是处于综合国力上升阶段的中国，同绝大多数国家关系的基本框架应是互利合作，友好交往，平等协商，彼此间无需搞对抗与斗争，对出现的分歧与矛盾，完全可通过对话磋商、互谅互让求得解决。经济上的正常竞争，只要相互处置得当，能够谋求双赢共赢。

有鉴于此，对待国力比我弱的国家，处于强势的中国应讲“仁”，“亲仁善邻”，宽容怀柔，“协和万邦”，不可锱铢必较，因小失大。对待国力强于我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处于弱势的中国应讲“谋”，立足于长远的战略考虑，发展合作，扩大共识，巧与对方周旋，妥善处理分歧，尽量避免正面对抗。当然，如果中国的重大利益受到对方的威胁和危害，别无选择时，就应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因此，当年江泽民针对中美关系提出的“不搞对抗”，即不搞针锋相对的斗争应成为中国外交一项普遍适用的原则。其含义是在处理与外国的矛盾、分歧时，不主动挑起对抗，不把斗争与对抗作为常用的外交手段，主要应通过对话、磋商与交涉求得解决；对于少数国家针对中国的不良图谋和政策行为，通常宜区别对象与问题的性质，辅之以必要的制衡，只有迫不得已时才最后采取斗争和对抗的方式。不搞对抗不是软弱可欺，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让步，而是从现实的国际战略形势和力量对比出发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的具体运用，是避免因“小不忍”而“乱大谋”，最终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和推进国家的根本利益。总而言之，以合作与制衡为两手的新提法深刻而准确地反映了新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特点，将其作为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与时俱进的表现。

合理部署和积极开展六个方面的外交工作，就是要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主要是大国）、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继续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努力把新世纪的外交工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使对外战略的实施更加卓有成效。

二、对大国的外交

在统筹部署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外交工作时，应把对大国的外交放在最优先的关键位置。这是因为大国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重大事务的处理，在相当程度上仍由大国主导。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和相互关系是决定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基本走向的基础性因素。对中国而言，与各大国的关系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安全稳定、统一大业和国际地位利害攸关。建国以来的历史证明，真正能给中国带来巨大利益和严重危害的都是大国。大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和国际事务中打交道的主要对象，加强与诸大国的合作、协调，可以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科技和文教事业的发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增强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发言

权,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鉴于新世纪大国关系的基本框架和中国与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中国对大国的外交战略应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以合作与制衡为两手,全面发展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力争并行不悖,良性互动。尽可能做到平衡而不搞等距离,有重点而不过分倚重某一国,以拓展广阔的外交活动空间。目前,中国已同美、俄、日、德、法、英等主要大国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中国与一些大国也存在着原则性的矛盾与分歧,其根源在于个别西方大国仍程度不等地抱有西化、分化中国的意图,妄图牵制乃至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这就迫使中国在增进大国合作的同时,不得不采取制衡或必要的斗争手段,防范和抵制个别大国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和损害。在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猖獗的世界上,仅有良好的合作愿望未必能达到互利合作之目的。对于不能尊重甚至企图损害中国权益的大国,有针对性地实施有效的制衡和必不可少的斗争是促成建设性合作的必要手段。

鉴于中国与美、俄、日、德、法、英等国的关系情况不尽相同,因此,中国对它们的政策也应该有所区别。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由于两国实力差距很大和相互需求的不对称,居于强势地位的美国在双边关系中占有某种主动性,美国对华政策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美国是影响中国外部环境的关键性因素。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和摇摆性。其对华政策的基点是接触加遏制,但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时期经常在以接触为主还是以遏制为主之间摇摆不定。目前,鉴于美国在“反恐防扩”、伊拉克战后重建和朝鲜核问题等方面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有所上升,美国暂时不把中国定位为现实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在政治、经贸和反恐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中美关系正呈现继续发展的势头。然而,中美原有的重大分歧与矛盾并没有消除。美国的新安全战略依然把崛起的中国列为头号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继续对中国进行预防性的遏制和西化、分化,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和最富有爆炸性的因素。正是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对中国安全构成综合性的威胁。基于以上情况,中国的对美政策应站在战略的高度,以合作与制衡对付美国的接触加遏制,力争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为提高对美国霸权政策、行为制衡的有效性,中国一是要靠实力,即“富国强兵”,壮大国力,同时努力争取国际上的借重力量,以形成对我有利的力量组合;二是靠合作、对话与协调,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和共识,妥善解决分歧,提高相互间的依存度,以使美国因顾忌招致自身利益受损而对某些针对我的政策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反对和

抵制美国的霸权政策行为时，可根据其危害程度，灵活采取不同方式。宜避免挑头，做而不说或做而少说，有时为避免引火烧身，可采取低姿态。由于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实力对比仍极不平衡，由于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依然将集中力量应对“打恐防扩”，不具备转移主要力量对付中国、围堵中国的条件，在这种情形下，以合作协调求制衡就显得更加重要。为此，应着眼于与美长期周旋，顾全大局，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刚柔相济，进退有据。在台湾问题上，鉴于实现统一的条件尚不成熟，应暂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维持现状，重点制止“台独”，以“文攻武备”为统一创造条件。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维持现状，不独不统，控台制华。鉴于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中国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可“借美制独”，约束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言行。但是美国维持现状政策的侧重点是反对大陆对台动武，阻挠统一，使两岸分立、分治长期化。因此，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会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不能幻想当中国迫不得已对台使用武力时，美国会不履行《与台湾关系法》，袖手旁观。中国所能做也应该做的是尽可能降低美国对台湾问题干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中国应力避与美发生大的正面冲突，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美有损我国国家利益的政策行为进行必要的抗争，以争取尽量延长目前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发展的进程。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的邻邦。俄罗斯独立以来，中俄关系所以能健康发展，得益于两国关系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两国肩负着振兴国家的相同使命，经济互补性很强，均需要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都认真记取历史经验教训，珍视当前的睦邻合作，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外交战略上有着许多共识，都承担着重大的国际责任。中俄关系得以保持稳定发展，关键在于两国政府能高瞻远瞩，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克服消极因素的干扰，在已有成就基础上不断跨越。中俄关系的全面发展，经济上互利互惠，安全上相互借重，在国际事务上合作协调，增强了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打交道的战略地位，有利于改善同周边国家，特别是中亚国家的关系，也有助于中国集中主要力量保障东南方向这个战略防御的重点。基于俄罗斯具有雄厚的发展潜力，预计在新世纪前期俄将实现重振大国地位的目标，基于中俄在安全、军事、能源领域和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同时也基于双方互有戒备的心理有待进一步消除，因此，中国宜将对俄外交置于优先地位，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多边合作的新平台，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两国业已形成的高层交往和政府合作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加强相互支持，深化政治互信；扩大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双赢；拓宽友好往来，发扬传统友谊；密切沟通协作，促进和平发展。当然，由于俄朝野中一些人对中

国迅速崛起心存疑虑，“中国威胁论”挥之不去，故对中俄关系的期望值也不宜过高。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毗邻而居。中日关系对双方、亚太地区和世界都十分重要。21 世纪前期，随着中国由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强国，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中日关系将上升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十年来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经贸伙伴。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日关系曾是中国与各大国关系中最好的。但自 1995 年以后两国间在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同时，政治上却屡生摩擦。1996 年日美强化同盟关系，明显含有牵制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意图。中日在历史、台湾、钓鱼岛、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军事大国化等问题上均程度不等地发生分歧与纠纷。特别是 2002 年以来小泉首相三次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两国首脑三年未能实现互访。导致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既有诸多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少矛盾；日本朝野部分人不能正确反省侵华历史罪责，却视中国的迅速发展为日本的“威胁”，中国民众对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也抱有戒心；日本社会弥漫着因经济长期低迷而产生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新民族主义和右翼保守势力明显抬头。国际背景则是美国布什政府变本加厉推行单极战略，力图借重和利用日本，以确立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以上情况表明，一方面中日关系对两国、地区和世界都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处于转折时期的中日关系不太正常的现状却与这种良好前景不相适应。为了使中日关系早日走上长期稳定发展的轨道，中国政府在保持对日政策连续性，继续实行合作加防范，以合作为主的方针的同时，应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的政策原则与举措。简言之是“四要四不”，即：要登高望远，不急功近利；要积极进取，不消极等待；要平等互尊，不相互戒备；要全面把握，不以偏概全。中日两国是同时处于战略上升期的亚太地区的大国，理应从长远和战略高度对待和运筹两国关系，要把亚洲的稳定与振兴作为中日两国新的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以中日合作推动亚洲合作，以亚洲合作稳定中日关系。不因追求眼前的具体利益而妨碍整体关系的发展；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妥善处理好存在的问题，不回避、不激化矛盾，通过对话磋商，扩大共识，化解分歧；要以平等互尊的心态认识和接受对方的正常发展，慎重处理对方关切的问题，增进互信，消除戒心；要正确全面把握中日关系，继续推进经贸往来，拓展合作领域，加强政治对话，适时把建立安全、防务的交流合作机制提到议事日程；要把历史问题放在中日关系全局的适当位置上，不因个别问题的凸显而影响双边关系的大局。21 世纪日本的发展前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合作，中国的复兴伟业也需要亚洲惟一发达国家日本的合作，两国相互需求将日益迫切，从长远看，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全面的合作发展是必然趋势。